

第三次读书报告

(元培学院 黄道吉 1600017857)

《“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首先点明了在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当下需要并且能够孕育对应的理论研究。随后在文献综述中再度强调西方学界的和中国以往的研究以利益为出发点，忽略了情感在群体性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缺少能解释中国现有群体性事件的理论，尤其是面对以非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事件。借助两个具体个案的描述，文章最后提出“气场”的六个层面，并用它解释之前提出的个案。随后将群体性行动和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对比，加强了对它的机制的理解。这篇文章呈现了许多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实际需要和理论空缺是这个研究的背景。这个研究是处在由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矛盾积累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多发的背景下的。数量更多的、更具典型性的群体事件既要求相关理论的进展，另一方面也成为案例分析的良好养料。而在理论方面，西方学界的“利益冲突-集体行动”范式、资源动员范式和政治过程范式或是将集体行动的原因归于群体利益的冲突，或是专注于群体的动员能力和拥有的政治机会。这些解释在中国或多或少是不切合实际的，尤其是面对以无利益相关者做主体的事件。这种解释的无力感是作者试图从情感视角入手的原因。在情感方面，西方的情感论早期提出了加值理论这一个经典的范式，随后注重情感的文化属性。结合早期和当代情感论的优势，作者选择用“气场”理论着手研究中国的群体性事件。这种理论可以认为是受到了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的启发¹。而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气”这一概念作为基层行动的伦理在学界也是研究甚少的。

两个个案分别是利益相关和非利益相关的典型事例，个案的选取正切合本文研究情感驱动的集体事件的主题，也分别代表文中由情感/利益之别对群体性事件的分类。每一个个案都能代表自己类别的一些事件，同时详细全面的描述也保留了每一个案例内部的复杂性，如对Z镇出逃的周孝忠和他的代理阿发的记述。对两个个案的陈述是随后详细解释“气场”理论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在行文上，对两个事件的陈述大都是基于时间顺序，并且完全客观，描述中不对行动者的意图做任何假设，而将对事件的解释放在阐述理论的部分。这样既保持原貌的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客观的事件，后文对“气场”理论的解释也得到客观事实的验证，更加可信。

在展开论述“气场”理论中作者赋予人们的行动以意义，并借助两个个案的

¹ 加值理论认为集体行动需要 1.结构性助因 2.结构性紧张 3.一般化信念 4.促发性因素 5.行动动员 6.社会控制（的下降），而“气场”理论似乎可以认为是更细化了集体行动的触发因素，需要初级和次级两层刺激激发人群的“气”；“气场”理论中的概化信念是指对触发事件的信念，而加值理论中的一般化信念似乎是人们对结构紧张的理解，这两点是不同的；并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补充了在社会控制过强的情况下的论述。

演化过程，展开“气场”的六个层次。理论对两个不同个案的成功解释表现了“气场”理论的效力。在结构问题层，C区中的结构问题虽然隐蔽，但结合当地十多年的发展仍能发现库区移民因经济困难与诉求被打压的失衡，和长久不得宣泄而弥散的怨气。信息在传播中不论是在熟人社会还是非熟人社会都被人们的怨气改造，这也印证了概化信念层的概念。在情景动员层中，作者认为Z镇的紧张局面是由聚集的群众形成，而不是草根行动者阿发，足够说明群众可以通过互相感染完成行动动员。

文章中多处运用类型学的方法。一方面对集体行动分类，强调文章讨论的群体性事件源于群众内部矛盾，也并不以违法犯罪为目的，这段论述直接引出后文对情感的论述。通过和维权行动对比，强调了群体性事件以“气”为原发性的基础、没有严密的组织、不那么受理性的控制。这种对比有助于理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结构性失衡导致的怨气不断积聚且难以化解是“气”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释放的原因；“气”以情景动员的方式在人群中激荡加压；“气”最终以大规模骚乱的方式释放。在群体性事件内部，对两种事件分别的分析表明不同种类的群体事件都有气场的参与，情感在事件的进展中都扮演驱动力的角色。因此在两种事件中适用的气场理论可以解释这两个个案代表的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中。在分类做对比的同时，作者也留意了不同种类之间的联系。

文章通过对群体性事件的机制分析，回答了在结构紧张和缺乏安全阀的背景下，群体性事件发展的过程。文章最后希望对这一过程的理解能利于今后更好的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体现了作者的现实关怀。